

DOI : 10.6256/FWGS.202010_(113).03

建立促進平權與行動介入的 COVID-19 數據：七個交織性女性主義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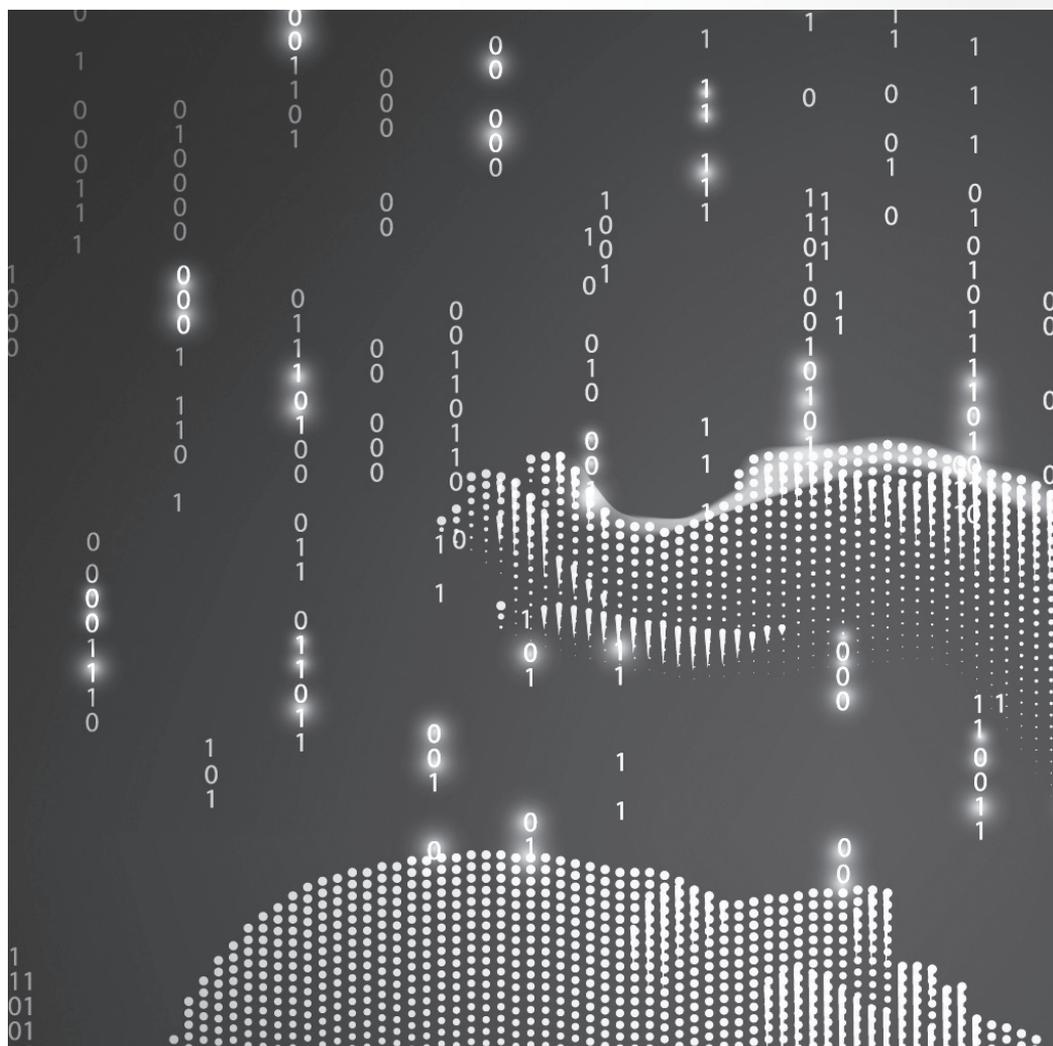
原作者 | Catherine D'Ignazio 與 Lauren F. Klein

導言與摘譯 | 余貞誼 |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原文出處：Catherine D'Ignazio and Lauren F. Klein (2020). Seven Intersectional

Feminist Principles for Equitable and Actionable COVID-19 Data. *Big Data & Society*,

July 2020. doi: 10.1177/2053951720942544 · 並獲得 Sage Publications 授權本刊摘譯。



導言

《數據女性主義》（*Data Feminism*）一書於 2020 年 2 月甫出版，即與疫情相遇。作者之一 Catherine D'Ignazio 為麻省理工學院都市研究與規劃系的助理教授，同時也是數據 + 女性主義實驗室（Data + Feminism Lab）主任；另一位作者 Lauren F. Klein 則是埃默里大學英語系和量化理論與方法系的副教授，也是數位人文實驗室主任。

兩位作者在書籍出版後，以書中提出的數據女性主義七原則，針對

COVID-19 中隱含的數據問題，提出警示。兩位作者在書中先帶領我們去思考何謂「數據」，她們認為，當我們把資訊識別為「數據」（而非以「證據」或「事實」來指代）時，是出於一種修辭的目的，意圖在將具有爭議的資訊，轉化為一種證據的基礎，以做出後續的宣稱。然而，在確認資訊可被信任、或確認其為可據以行動的事實之前，什麼資訊、誰的資訊可以變成數據？書中以「預測性警務」科技（PredPol, predictive policing technology）為例，帶我們看見這種以過往的犯罪數據做為訓練的數據，來預測巡邏警力該如何有效配置的系統，正凸顯「數據」背後埋藏了尚未被確認的事實。當美國警方過往總是不成比例地在有色人種街區安置較多警力，當地的犯罪行為就容易被警察看見並列為紀錄（反之，犯罪率較低的區域，不見得是因為沒有犯罪行為，而是犯罪行為沒有被警察看見、納入紀錄），那麼以此犯罪數據而來的預測系統，就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迴圈（*pernicious feedback loop*）：美國黑人長遠的犯罪歷史造成了有偏見的警力佈置，這樣的佈置生產了有偏見的歷史數據，而數據又被用以發展一個預測未來的風險模型（D'Ignazio & Klein, 2020: 28）。可見若我們不去思考並追蹤系統的生成過程，那麼系統的建置很可能既反映過往的歧視行動，也放大並增強歧視行動的效應。



延續著如此對數據工作及其蘊含的權力蹤影的反省，這篇短文帶領我們去思考，當 COVID-19 的風暴洶湧襲來，國家體系將數據視為探見疫病治理與病毒知識的窗口之時，數據如何可能同時也是一種權力運作的黑手；在數據工作伸手的股掌中，有誰被承接，而又有誰在縫隙中被遺漏？兩位作者提醒我們，理解隱藏在疫病治理中的數據工作有哪些權力要素，能幫助我們意識它如何帶來不均衡的風險分布，以利去思索並制定挑戰和導正權力不均等的策略。

摘譯

《數據女性主義》這本書以交織女性主義為基礎，探討數據科學與數據倫理，並提供七個原則來挑戰數據科學中的權力和特權。這七個原則包括：檢視權力、挑戰權力、提升情感和身體體現、重新思考二元對立和階層、擁抱多元論、考量脈絡，以及讓勞動力被看見。當時在書寫這些原則時，我們無法預料到未來會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散，但我們建構的這些原則，及其激起的經驗教訓，教導我們要去預先考慮這個致命病毒所帶來的效應。我們的地區和國家支持系統已經崩壞，由有權者和財團所做的國家決策。造成的危害後果則由最沒有權力者來承擔。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們將根據我們所建構的七個原則，從冠狀病毒事件中提取相應的七

個例子。每一個原則皆可以幫助我們辨認，在冠狀病毒帶來的影響效應中，如何映現著既有的權力不平等，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去導正權力不均衡的樣態。

在開始之前，我們想要說明幾點。身為作者，Catherine 和 Lauren，當我們在這篇短文用「我們」這個詞時，並不是要將它延展成一個普世的代稱。在討論 COVID-19 時，我們只把討論限定在美國的脈絡，即使有時談到美國以外的例子，那也是從我們身處美國的觀點所抽取出來的視角。最後，我們也要更清楚的表明，我們說的女性主義是一種交織性的立場，且其所討論的女性主義之起始點，不僅只是女性或性別，更多是關於權力，關於誰擁有權力而誰沒有，以及權力的不均等可以如何被挑戰和改變。

原則一：檢視權力（examine power）

數據女性主義的起始，在於分析權力如何於世界上運作。所謂權力，指的是當前結構性特權和結構性壓迫的形態，讓某些群體佔據優勢（因為系統是從他們的觀點來設計、並為其服務的），讓其他的群體屈居系統性的弱勢（因為系統不是為他們設計的、也從未考慮其需求）。在美國，這個結構性的不平等，展現在 COVID-19 對黑人社群

所帶來的不成比例的效應。

數據女性主義對數據科學中的權力問題探究的是：數據科學是為誰而做的？是誰來做的？數據科學所秉持的是誰的利益和目標？面對新型冠狀病毒，這些問題（包括數據庫、模型和其他相關的數據計畫）幫助我們去披露政府和其他有權組織如何控制數據收集和決策制定的觀點。例如，從3月到5月的11週，美國CDC沒有發佈有多少人接受了病毒檢測。當一個CDC的新網站悄悄公開了病毒檢測的數據時，這個數據卻被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證實與政府所公布的不相符合。此外，死亡數也同樣被低估。當傳聞紛紛說著男性的死亡率較女性高，黑人、原住民和拉丁裔社區遭受的衝擊也更嚴峻時，國家卻沒有針對性別、種族變項進行可靠的資料追蹤和收集。

我們必須意識到，每一個數據收集的決策，都關乎權力問題。唯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幫助我們去應對這些數據收集的問題。

原則二：挑戰權力（challenge power）

數據女性主義致力於挑戰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並爭取正義。換言之，僅是披露數據收集和數據科學中的不平等權

力關係還不夠，還要去導正和重新平衡權力的分布。在《數據女性主義》書中提出了幾個方法去挑戰隱藏在數據庫和數據計畫中的權力，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收集反數據（counterdata），特別是收集那些制度機構不去收集、但事實上卻對於理解問題來說很重要的數據。

我們可以從「Data for Black Lives」的工作（彙編美國各州黑人受到冠狀病毒影響的綜合數據集）得到例證。這個工作小組在其網站寫到，「在最需要數據的時候，通常都拿不到，因為關於黑人社群的數據通常都不被收集」。另外，記者Alisha Haridasani Gupta也列出了一些缺失的知識，例如：為什麼男性的死亡率較高？懷孕女性會有較高的風險嗎？要解開這個謎團，我們唯有進行資料收集和分析才有可能達成。雖然收集反數據並不會讓不平等消失，但它是讓有權機構負起責任的重要策略。

原則三：提升情感和身體體現（elevate emotion and embodiment）

數據女性主義教導我們要去重視多重形式的知識，包括來自人們活生生的、感覺性的身體知識。如此的原則挑戰了數據溝通應該要是中性、理性、且僅說事實的前提。在上述前提下，情感

通常會被數據科學流放，認為那是會把主觀性偷渡進客觀性過程的可疑份子。Donna Haraway 已挑戰了這個虛假的二元對立假設，並提出處境知識（所有知識都源自於一個特定的時空、特定的社會和政治脈絡）的概念，幫助我們理解所有知識都受到生產者的特定觀點所形塑。

將情感也視為是數據科學計畫中的一環，能讓我們重新回到數據起源的身體。如果我們想要在這個健康風險不均等分布的疫病中，從事負責任的資訊視覺化，更要特別重視情感與身體體現。每一個死亡計數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數字，但都代表一個家庭、朋友和社群成員的逝去，因此這些數據的背後都意味著創傷。資訊研究學者 **Faith Day** 主張應該要從女性主義照護倫理學的角度來呈現數據。此外，透過數據，我們也看不見在前線從事照護工作的勞動者身影，而藝術家 **Aya Brown** 的系列肖像則讓我們有機會去向這些照護者致敬。

原則四：重新思考二元對立和階層（rethinking binaries and hierarchies）

數據女性主義需要我們去挑戰性別二元對立及其造成的壓迫。這個虛假的二元對立把其中的階層性隱藏起來（即男性居於社會階層的頂端並主導社會制

度）。這個虛假的二元對立及其隱藏的階層，滲透了所有關於數據收集和分類的決策過程。例如，從隱藏的階層性來看，當初決定不要按照性別來收集死亡數據時，就無法得知男性有較高的死亡率。然而一旦當局意識到男性有較高的死亡率時，馬上就按照性別來追蹤相關數據。不過，對於將性別做為數據追蹤變項的決策，並未延伸到對照護工作、護理工作、家務工作及零售業服務員等人口結構的統計，自然也就忽略了誰比較容易曝露在病毒中的問題。此外，當局也未意識政策決議的性別化效應，如





封鎖的禁令如何會使女性和小孩遭受更多家暴的風險。

在二元對立的面向上，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分類也忽略了疫病對跨性別、非順性別常規者的效應。這些風險包括近用健康照護、食物、居家安全的不同程度，以及二元性別劃分的檢疫隔離政策。當然，如果要去追蹤這些數據，也會造成「暴露的兩難」（paradox of

exposure），因為數據收集會增加這些群體的可見性，而這可能會帶來風險和潛在危害。由此可見，數據計算總是複雜的，必須要根據脈絡來討論。因此在做出關於數據計算的決策（計算什麼、誰被計算、如何計算）時，都需要審慎考慮脈絡議題。

原則五：擁抱多元論（embrace pluralism）

數據女性主義堅持最全面的知識來自於將多重觀點整合起來，並優先重視在地的、經驗性的認識型態（即從直接受到議題衝擊者的觀點來產出可信賴的知識）。例如，Google 和 Apple 提議使用數位追蹤應用程式來追蹤病毒的傳散。但 Ali Alkhatib 指出這樣的方式會排除窮人、孩童、和其他未被計入的群體，而這些群體可能都是最易受到危害的族群，其觀點應該優先被重視。不過，若要涵納這些群體，也難以保證這個應用程式不會成為另一種政府監控的方式。

接觸追蹤也是疫調的一個方式，但是成功的接觸追蹤，取決於人們是否信任政府代表、會說實話、會遵守隔離準則。這在美國凸顯出一些問題，例如紐約州宣布其在彭博慈善基金會資助下，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全球健康組織 Vital Strategies 來執行辦理接觸追蹤計

畫。此舉便讓以紐約為基地的社區健康團體發動譴責，認為這個接觸追蹤計畫沒有與黑人和拉丁社區建立緊密連結的做法，忽略了在地知識的重要性，因為當局根本沒有意識到當地的社區團體過往已克服了重重困難來對 HIV/AIDS 和肝炎進行成功的接觸追蹤。這個例子又再度凸顯了數據缺失的現象：政府當局不去擁抱多元性（即與在地組織的關係基礎建設連結），反而擁抱菁英觀點來維護現狀。

原則六：考慮脈絡（consider context）

數據女性主義主張數據不是中性的也不是客觀的，而是不平等社會關係的產物。因此，在處理正確、具倫理的分析時，考量脈絡是基本的要求。

許多國家在疫病期間都進行數據調查，病例數、致死率、受影響的人口比例等。不過，每一個國家的調查報告都受到特定資料收集條件的影響，例如做幾次檢測、以哪些人口群作為樣本、在報告數據上的可信度等。所以，在比較各國數據時，需要理解這些差異的效應。

這也不僅是關於數據遺失或數據不確定的問題。就算有精確的數據，也並不意味著問題就會被解決。我們更需要

考慮的，是在詮釋數據時考慮脈絡的角色。例如，「Data for Black Lives」等群體就開始反對「任何使用 COVID-19 的數據來強化種族作為風險因子的敘事」，因其忽略了種族歧視在之中扮演的角色。這顯示的是，去呈現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對黑人社群造成負面健康結果的調查，反而讓這些社群蒙受更多被歧視的風險，而非讓自己意識到本身的健康風險。如同 Joia Crear-Perry 對孕產健康議題的解釋，「種族不是風險因子，種族歧視才是」。

原則七：讓勞動力被看見（make labor visible）

數據科學的工作是眾人之力集合而成。數據女性主義讓這些勞動力被看見、被肯認和被賦予價值。當疫病導致工作場所關閉，且遠距工作的措施還未建立起來之時，披露了一個平常不被注意到的事實：日常使用的平台之所以能運作，基本上是靠著人力在支持。例如這段期間的 Google 搜尋準確力下降，Facebook 的垃圾貼文也變多，都是因為以前修正 Facebook 動態彙整，和手動調整 Google 搜尋演算法的人力大軍無法上班的結果。此外，這個看不見的勞動力還延伸到後疫情世界。維持大眾生活基本需求的工作者（如超市員工、加油站員工、健康照護員），拿著最低工資冒著風險在工作；而拿著高額報酬的

工作者則可以安全地待在家中保護自己和家人。如果說冠狀病毒有帶來一件正向的事物，那就是它暴露了全球經濟賴以維繫的勞動力。而身為學者、數據科學家、世界公民的責任，就是讓這些勞動力得到適當的酬賞、重視，和命名。

尾聲

這場疫病讓我們更意識到生活週遭的不平等現象，並砥礪我們要往正義的方向前進。Instacart、Amazon、Target 和 Whole Foods 的員工在 5 月 1 日舉行罷工，呼籲大眾注意他們如何在沒有危險津貼、病假和任何工作安全保護的狀態下被放到前線。5 月明尼納波里斯警

察局警員射殺 George Floyd，其後引起的抗議行動也促使人們去意識到，警察對黑人的暴力也是一種長期存在的流行疫病。

我們透過交織女性主義的濾鏡來思考 COVID-19 的經驗，應該有助於我們在這個時刻做好準備。如同黑人女性主義學者和運動者教導我們去看見的，流行疫病是交織的，根深在種族、性別和階級等錯雜下的結構不平等之中。對於閱讀這篇文章的白人學者，我們的責任是去致力於對抗制度中的種族歧視，並在我們的教學和訓練中去殖民化，以能夠真正參與實際受影響社群的觀點，並追隨黑人女性們的領導。



參考文獻

D'Ignazio, C., & Klein, L. F. (2020). *Data Femini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